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二战以来形成的全球治理模式和格局，由于美国奉行的“新孤立主义”和英国脱欧事件的冲击难以维系。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日渐成为全球治理创新的共同价值观和主阵地。

全球治理体系的解构与重构

随着技术进步的迭代叠加和各种思潮的冲击回荡，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开放的功能态的巨复杂系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准判断世界大势，打开国门搞建设，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在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的同时，不断构建新的全球治理体系。新的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全球治理结构如何完善应该由各国共同来决定。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好地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积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提高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推动建设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国际

社会应对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的能力。

提供世界性公共产品，弥补全球治理制度赤字

当前，人类发展面临新拐点，需要爬升新台阶，需要破解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等四大制度赤字。破解治理赤字重在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充分发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欧盟等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的建设性作用，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信任赤字构建命运与共的全球伙伴关系，让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互信互敬，加强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加深相互理解和彼此认同。破解和平赤字重在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实现世界长久和平。破解发展赤字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发展成果。更好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引导经济全球化更加健康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迅速

发展的经济大国，作为处于深刻转型中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中曾经深受其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对于现行国际规则的灵活运用。然而，随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社会思潮和国际政策的转变，随着中国在全球经贸领域的快速增长，提供世界性公共产品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如何积极参与并发挥引领作用，通过创新和完善，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结构和规则体系，已然上升为至关重要的议事日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深入展开全方位外交布局的重大方针，并进一步廓清了我国的全球治理观和国际责任观，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创新全球治理，重在六个层面的全面发力

中国在冷战后全球化中的胜出，并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而是全球治理模式创新引领力的竞争。中国需要做的是顺应人类发展的共同需求，参与建立一套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规则。当前，技术创新的影响已经从传统的学术领域、产业领域向公共治理领域延伸。全球治理创新正沿着“技术共识——责任共识——伦理共识——利益共识——政治共识——法律共识”六个层面层次推进、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着全球治理格局。

技术共识成为全球治理争夺的新

原点。谁掌握了技术创新主动权，谁就掌握了世界发展的方向。基于前沿领域研究以及转化应用的技术共识已经成为全球治理争夺的新原点。云物大智（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把世界装备得面目全非，区块链、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又在改造着全球治理的基因。移动网络信息技术和算法使得信息传播泛在化，传统物理疆界形同虚设，给社会治理带来极大挑战，已成为新时代全球治理主动权的争夺焦点。

责任共识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预埋。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已经不仅仅是科学家、企业家的职责，更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的重要责任。技术创新早已打破地域和国界限制，能否在全球配置技术创新资源，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技术创新能力与水平的重要指标，能否承担起或引领技术创新的重要责任，是一个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体现，能否以共同责任凝聚各国对技术的共识，则是一个国家引领全球治理的重要预埋。

伦理共识成为全球治理的调整器。以怎样的原则推进技术创新、落实技术创新的责任，是事关技术伦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技术创新对全球治理影响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基因编辑、生化武器、环境治理等方面出现的各类事件，凸显了技术伦理的极端重要性。人类作为一个共同的命运体，只有坚持共同、公认、普惠的伦理共识，才能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起到积极引导和严格的规范，也只有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原则，才能

形成人类技术创新命运共同体。因此，在各国普遍重视和加强技术创新的背景下，通过对技术创新伦理共识的树立和倡导，能够对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作出积极的调整。

利益共识成为全球治理的新焦点。在技术创新影响领域和程度不断扩大的时代背景下，技术创新必将带来丰厚的利益。得益于技术创新优势和所形成的知识产权优势，国际技术型公司的市值规模不断扩大。利益共识是技术创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最佳体现和生动阐释。对技术创新的竞争实质上就是利益的竞争，技术创新背后的利益争夺以及利益共识必然成为全球治理的新焦点。

政治共识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保障。技术创新的背后必然有国家间的政治博弈，技术创新特别是国际性的大科学和大工程需要政治共识作为重要保障，缺乏共识的政治博弈必然会导致地缘博弈、封闭排他小圈子等零和博弈现象，很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当今具有世界影响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ITER）计划、伽利略合作计划、全球对地观测系统计划、全球变化研究计划等，不仅对所涉及的技术领域产生了重要推进，而且对各国的政治发展也带来了重大影响。因此，作为全球治理新工具，技术创新背后所蕴含的政治理念、政治方向和政治共识，是推动全球治理的重要保障。

法律共识成为获取制度利益的重要手段。推动建立一个法制世界是全球治理的最高层面，国际争端的解决

越来越寄希望于国际仲裁体系和国际法院系统，技术创新正通过技术共识的基础作用，唤起各国对技术创新形成的责任共识和伦理共识。通过利益共识和政治共识的争夺与博弈，最终使各国在国际法律制定权、话语权上角力竞争，从而加强对全球治理格局调整的影响。

在全球治理体系创新中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是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更是全球治理理念创新、新的世界性公共产品提供的发起者、推动者和引领者。在完善和创新全球治理过程中，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不仅要看到中国发展对世界的要求，也要看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把维护中国利益同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完成全球治理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变，不断搭建全球治理新平台。重点把控中国融入全球治理体系，把握并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节点和重要举措。一是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和统筹协调能力。二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传播新的、科学、适应历史发展的价值理念，利用好国际平台，发出中国声音，持续产生影响力。三是努力提升大国地位，高举联合国这面多边主义旗帜，充分发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欧盟等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的建设性作用，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四是利用好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中国主导的全球治理平台工具，不断提升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发展持久互动、相互信赖的双边关系，并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打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企图通过控制资本和技术以及相关的制度设计（WTO、世行、IMF等），实现对产业链高端部分的垄断和控制，让欧美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去承担产业链的低端部分这一全球游戏规则旧格局。



从年号变更看日本政局变化

□ 梁亚滨 张茜皓

2019年4月1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公布了日本的新年号“令和”，英文名 beautiful harmony，这是日本首次引用本国典籍命名的年号。令和代表的美好和顺利之意的背后是日本国的国家意识和独立意识正悄然觉醒并愈发强烈。

日本强人政治的崛起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令和元年进入其第四个任期。截至2019年10月21日，安倍晋三总计在任天数为2856天，已经超过他的外叔祖父佐藤荣作，成为日本战后任期最长的首相。安倍自2006年就任首相，第一次政权维持一年后宣告结束，后又在2012年的选举中胜出，同年末重掌了政权。2015年总裁选举无投票再次当选，2018年击败石破茂，第四次当选。作为自民党总裁的任期到2021年9月末为止，至今还剩下两年多的时间。其实，只要能维持到今年的11月20日，那么安倍就将超过桂太郎（2886天），成为日本宪政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7月的参议院选举后，安倍表示希望在令和时代能够有更大的作为。

9月11日，安倍新内阁成立，口号为“安定与挑战”，由2名留任、15名新任和2名再任阁僚构成。内阁组成向来是外界猜测新政府未来政策的重要参考因素。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人物是新任外相茂木敏充。茂木于1978年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先后在丸红、读卖新闻、麦肯锡工作，也曾任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有过留学经历，2003年担任外交副大臣时期出版著作《日本外交的构想力》。在该书中，他提出了日本外交的两大支柱，一是改变以往“追随美国”的政策，以从“对美协调”到“说服美国”为前提，强调日本强人领导的重要性。二是以具有国际化特征的日本援助为前提，运用中立、积极、和平的解决之道来处理地区问题。上任后，茂木主张建立以安全保障、经济合作、相互理解和促进友好为支柱的

“世界中的日美同盟”，同时强烈呼吁日本“必须把目光转向亚洲、中东乃至世界”，特别提出“把日中关系放置在亚洲乃至全球的层面上来看待”，体现出日本新内阁的“世界眼光”。作为具体的外交方针，他提倡“像跳入对方的怀里互相推拉的柔道运动员一样的关系”，被称为“柔道型外交”。日本应该对美国、中国等超级力量进行“柔道型干预”。这一“柔道型外交”已经在日美贸易谈判中取得了实绩。9月23日，日美自贸协定签订，将因为美国退出TPP而陷入麻烦的日美经贸关系重新拉回正轨。

此外，“红人”小泉进次郎作为环境大臣首次入阁，令外界反应强烈。安倍晋三在谋求自己政权稳定的同时，不忘培养接班人，要把亲手培养的“将来的总裁候选人”拉进圈子里。小泉进次郎的曾祖父父次郎在战前担任众议院副议长和通信大臣，祖父纯也氏是防卫厅长官，父亲纯一郎从2001年4月开始担任了约5年半的首相。所以，小泉家是自民党内屈指可数的政治世家。尽管小泉进次郎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曾两次投票给原干事长石破茂而不是安倍，但仍然获得了安倍的认可和提携。所有人都认为，小泉进次郎是未来日本首相位置的强有力竞争者。今年38岁的小泉进次郎如此年轻入阁还是日本战后政坛史上的首例，可以为未来执政充分积累经验 and 锻炼能力。从安倍家和小泉家的政治传承来看，日本政治的未来将继续向强人政治方向发展，很可能一改日本历史上短暂政权不断交替出现的状况。这毫无疑问会大大增强未来日本政权的稳定性和政策的延续性，成为日本实现正常国家的强大助推力。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应对不断涌现的各种挑战，多个国家纷纷出现强人政治现象。在国家独立意识逐渐高涨之际，安倍首相的长期执政和一直较高的支持率事实上也打造出日本版的强人政治。朝日新闻社在8月份进行了全国舆论调查（电话），安倍政府的支持率为48%，比上次7月下旬的调查结果

42%上升6个百分点。其中，男性支持率大涨7个百分点，超过半数，达到54%。女性支持率虽然依然低于50%，但依然从37%增加到42%。来自无党派阶层的支持率也有所增加，从18%增加到23%。由此可见，日本国内民众整体上对安倍内阁比较认可和支持，且有所期待。

试图挣脱美国束缚的日本对外政策

回顾战后的日本外交，从首相频繁更迭的情况来看，其主动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美国手里，因此日本多数的对外政策都是对美政策的一部分。日本著名学者孙崎亨曾在他的著作《被美国击败的政治家们》一书中明确指出美国对日本政治家拥有强大的操控能力。但是，随着国际政治格局和美国对外政策的转变，这种操控能力在迅速下降。在特朗普总统频繁退群并要求日本承担更多的同盟责任之际，安倍政府感受到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将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实现国家正常化结合起来，前者成为后者的实现手段和路径。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可以发挥更多的外交自主性，逐渐摆脱美国的束缚。日本的对外政策越发自信和遵循特朗普政府的类似逻辑，坚持“日本优先”。这突出表现在贸易上打压韩国和抵制美国倡导的波斯湾联合护航舰队两件事上。

经济上，日本开始不顾及美国态度，施展硬实力对韩国进行制裁。美国在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同盟体系支柱是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对美国来说，加强和深化美日韩之间的关系，将双边同盟逐渐改造为三边同盟，是维护东亚地区霸权的重要举措。事实上，在美国的撮合之下，日韩关系也一度非常亲近。2007年8月，美日两国政府签署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2016年11月23日，日韩签订同样内容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意味着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关系迈出

了实质性的一步。然而，G20大阪峰会之后，日本政府因为历史和贸易问题突然对韩国进行一系列贸易制裁，使两国关系迅速恶化。非常明显的是，安倍政府此次对韩政策与美国的战略和想法无关，完全是日本决定对韩国实施报复。据多位日美外交相关人士透露，美国政府为了防止韩国脱离《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曾要求日方延迟发布将韩国从出口优惠对象国的名单中排除的信息。但是，日本政府有关人员却说：“当日本在慰安妇和征用劳工问题上被韩国狠狠地教训时，美国什么都不做，事到如今突然介入也太晚了。”作为对日本的报复，2019年8月22日，韩国政府决定作废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日本政府此次非同寻常的决断，凸显出对外政策中试图摆脱美国束缚的独立性。这种完全不顾及日韩关系恶化的做法，事实上破坏了美国需要维持和强化美日韩军事合作的东北亚战略。但是，这也增强了日本在未来对美和对韩谈判中的筹码——日本有能力对韩国这样的中等强国实施强有力的经济打击。

事实上，在经贸领域，日本在安倍首相的带领下表现出超强的把控能力。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之后，日本继续推动其他成员国最终达成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随后，日本又在今年2月份与欧盟达成“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10月份与美国签署自贸协定。日本也成为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同时与美欧两大经济体达成高水平自贸协定的国家，在新一轮全球化的进程中成为令人瞩目的先驱者。这是日本敢于对韩国“亮剑”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向世界传递出简单而明确的信号：日本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不但拥有影响其他国家的实力，而且必要时也愿意运用这种实力；同时，日本在运用这种实力的时候并不像以前那样对美国马首是瞻。

军事上，消极应对美国提出的护航要求。2019年上半年，美伊关系因为美国终止伊核协议而不断恶化，波

斯湾地区连续出现多起油轮遭袭事件。为了维护该地区的航行安全，特朗普总统号召组建联合舰队护航，并获得了多个国家的支持，包括韩国。但是，日本政府却在该问题上一再暧昧，没能积极地回应美国的要求。日本国内讨论的更多的话题集中于如何解决日本所有和日本人乘坐的船只的护卫问题。如果日本要参与美国组建的联合护卫舰队，如何处理与宪法之间的关系？对此执政党回答说：“目前还没有考虑向联合舰队派遣自卫队”，在野党也以“现行法律无法派遣自卫队”为由表示反对。担任海上自卫队自卫舰队司令官的稻田洋二也认为：“为了保护日本船舶，没有必要进行集体自卫权的讨论。军事紧张加剧，恐怕会导致战争。”如果加入国际护航联盟，日本海上自卫队虽然可以共享美军掌握的波斯湾地区的军事与政治情报，但同时也意味着伊朗成为日本的假想敌国，因为美国坚持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阿拉伯半岛周边海域、也门等发生的恐怖事件直接或间接地与伊朗有关。因此，一旦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爆发，加入了护航联盟的日本便自然成为伊朗明确的敌国。对日本来说，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艇和飞机，主要目的应该是向国内外表明“日本不能容忍本国的油轮受到某种危害”的国家意识，而不应绑在别国的战车上。

总而言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博弈越发激烈。安倍长期执政不仅大大增强了日本内外政策的稳定性，而且也反过来巩固了安倍政权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在不断动荡的国际格局中越发体现出一定程度的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日本对外政策的独立性，进一步证明了世界多极化趋势。

